文資學報｜ISSN 1814-3121｜第十三期｜頁9-32 ｜民國一〇九年｜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JOURNAL OF CULTURE RESOURCES｜NO.13｜2020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School of Culture Resources

《基隆市誌》中六塊涉外事件紀念碑的史事探述

姚開陽／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基隆市志》無論那一年代的版本，都同樣記載有六塊英文石碑，似乎是紀念很重要的涉外事件，但由於市志沒有附上碑刻的內容，加上現在六塊石碑都已不知下落，難以確定市志的記載是否真實，但感覺上似乎有問題。

透過搜尋文獻與田野調查，發現市志的記載與石碑真正紀念的事情絕大部份無關，但由於其錯誤是誤植另一真實的歷史事件，很容易讓人不察而相信，這可能就是《基隆市志》與坊間出版的碑刻相關書籍錯誤超過六十年卻始終未更正的原因。

本篇論文糾正了《基隆市志》長久以來的錯誤，並且延伸說明六塊紀念碑背後所涉及清代西方人在台灣周邊海域活動的歷史，雖然沒有市志原來以為的那麼重大，但仍然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資產，不應該任其錯誤下去。

關鍵字：基隆、海事、洋人、紀念碑、清代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6 Monuments of Foreign-related Events in the Chronicle of Keelung City

Yao,Kai-Yang

ABSTRACT

The Chronicle of Keelung City were recorded there are six monuments seem to be a very important foreign-related event, but because the city chronicle has not attached the original content, and now the six monuments are gone, Therefore,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cords of the chronicle are true,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

Through the search for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city chronicle record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ctual commemoration of the monuments. However, because the mistakes are also real historical event, 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be-lieve it, this may be the reason why the city chronicle have been wrong for more than sixty years but have not been corrected.

This paper corrects the long-standing mistakes of *The Chronicle of Keelung City* and described the history of the marine activities in Formosa water of the Wester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Although it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original imagination, but i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assets in

Keywords : Keelung, Maritime, Foreigner, Monument, 19th Century

一、 前言

在《基隆市志》(1958年版及2001年版)中有關於清末六塊涉外事件紀念碑的記載，[1]然市志中對於其紀念事由的敘述似有不合理之處，引起筆者研究的動機。六塊紀念碑中四塊在二沙灣，二塊在仙洞巖。二沙灣原為海水浴場，70年代後填海築碼頭，地貌已全非，仙洞巖中的寺廟亦經過多次改建，目前各碑皆已難尋。

《基隆市志》對於六碑的敘述最早出現於1958年版，此後所有版本內容完全一致，再查考其他碑刻相關書籍敘述亦雷同，可能引自同一來源，考察其文字用辭似是翻譯自日文，所以可能沿襲自日治時代的文獻。然由於《基隆市志》中未附照片或拓印，亦未抄錄碑文，因此無法比對其敘述是否正確。

經筆者蒐集日治時期文獻包括石坂莊作(1870-1940)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加上找到部分碑刻的照片，終於釐清各碑原始內容，發現與《基隆市志》中的紀載出入甚大，並推測其錯誤產生的原因，故撰本文。

二、 文獻探討

以下是1958年版《基隆市志》對六塊石碑的敘述。

>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
>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在沙灣山前，即海水浴場附近。碑高四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碑時面現薄白黑點，建於同治十年，相傳為爭採基隆煤礦，為我琉球藩民牡丹藩人所殺者。

---

1 陶文輝編篆，《基隆市誌》(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8)，頁10-11。同樣內容出現在：李進勇編撰，《基隆市志》(基隆市文獻委員會，2001)，卷四、經濟志、交通篇、第六章觀光事業，頁154-155。

Samuel Moyes紀念碑:

Samuel Moyes紀念碑，在本市二沙灣山前，亦在海水浴場附近，為茶褐色之石碑，碑高四尺五寸闊二尺二寸，建於光緒二年，相傳為攻略花蓮太魯番之荷蘭人。

H.M.S. Serpent石刻:

H.M.S. Serpent等紀念石刻，在仙洞窟內，所謂「秘密深窟」，約八十尺之深，刻於自然巖面上，橫六尺，縱二尺八寸之石碑，建於同治五年，傳聞為紀念來基鼓勵栽培茶樹之英國人名羅托者。

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石:

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在仙洞約在洞內深四十餘步之巖壁上，此為咸豐十年(西元1860年)葡萄牙之「愛魯波」號，駛至高雄，有「利希杜何天炎」者，來淡水港一帶調查地質時所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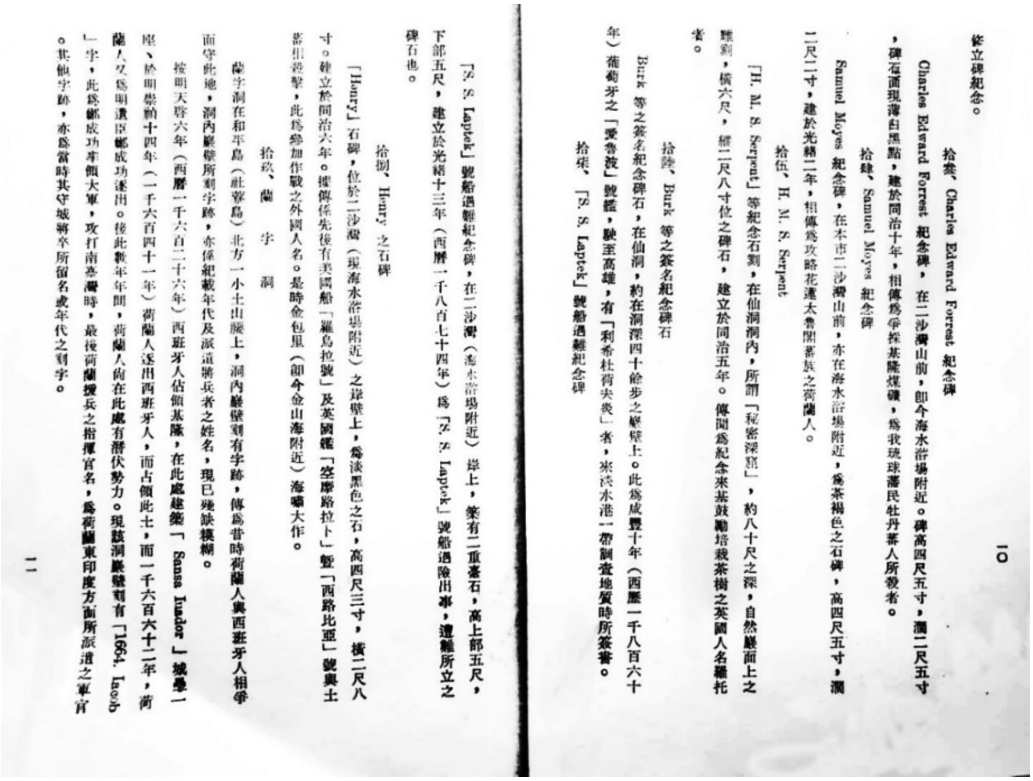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在二沙灣(海水域場附近)岸上，築有二重石台，高上部五尺，下部五尺，建立於光緒十三年(西元1874年)為「S.S. Laptek」號遇險出事，遭難所立之碑石也。

「Henry」石碑:

位於二沙灣(海水域場附近)之岸壁上，為淡墨色之石材，高四尺三寸，橫二尺八寸，建於同治六年。據傳係先後有美國船「羅烏拉」號及應國艦「空摩路拉卜」暨「西路比亞」號與土藩相殺擊，此為參加作戰之外國人名。是時金包里海嘯大作。[2]

2　陶文輝編篆，《基隆市誌》，頁10-11。



拾柒、Charles Edward Forrest 紀念碑

Charles Edward Forrest 紀念碑，在二沙灣山前，即今海水浴場附近。碑高四尺五寸，濶二尺五寸，碑石質現淺白堪點，建於同治十年，相傳爲爭採基隆煤礦，爲我琉球藩民牡丹蕃人所殺者。

拾捌、Samuel Moyes 紀念碑

Samuel Moyes 紀念碑，在木杏二沙灣山前，亦在海水浴場附近，係茶褐色之石碑，高四尺五寸，濶二尺二寸，建於光緒二年，相傳爲攻略花蓮太魯閣蕃族之荷蘭人。

拾伍、H. M. S. Serpent

「H. M. S. Serpent」等紀念石刻，在仙洞洞內，所謂「秘密深窟」，約八十尺之深，自然巖面上之雕刻，橫六尺，縱二尺八寸位之碑石，建立於同治五年。傳聞爲紀念來基鼓勵培栽茶樹之英國人名羅托者。

拾陸、Burk 等之簽名紀念碑石

Burk 等之簽名紀念碑石，在仙洞，約在洞深四十餘步之巖壁上。此爲咸豐十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葡萄牙之「愛魯波」號艦，駛至高雄，有「利希杜荷夫炎」者，來淡水港，帶調查地質時所簽署。

拾柒、「S. S. Lapiek」號船遇難紀念碑

「S. S. Lapiek」號船遇難紀念碑，在二沙灣（海水浴場附近）岸上，築有二重基石，高上部五尺，下部五尺，建立於光緒十三年（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爲「S. S. Lapiek」號船遇險出事，遺難所立之碑石也。

拾捌、Henry 之石碑

「Henry」石碑，位於二沙灣（現海水浴場附近）之岸壁上，爲淡黑色之石，高四尺三寸，橫二尺八寸。建立於同治六年。據傳係先後有美國船「羅烏拉號」及英國艦「空摩路拉卜」暨「西路比亞」號與土番相接擊，此爲參加作戰之外國人名。是時金包里（卽今金山海附近）海嘯大作。

拾玖、蘭　宇　洞

蘭宇洞在和平島（社寮島）北方一小土山腰上，洞內巖壁刻有字跡，傳爲昔時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相爭而守此地，洞內巖壁所刻字跡，亦係紀載年代及派遣將兵者之姓名，現已殘缺模糊。

按明天啓六年（西曆一千六百二十六年）西班牙人佔領基隆，在此處建築「Santa Isador」城壘一座，於明崇禎十四年（一千六百四十一年）荷蘭人逐出西班牙人，而占領此土，而一千六百六十二年，荷蘭人又爲明遺臣鄭成功逐出。後此數年年間，荷蘭人尚在此處有潛伏勢力。現該洞巖壁刻有「1664, Iaoob」字，此係鄭成功率領大軍，攻打南臺灣時，最後荷蘭殘兵之指揮官名，爲荷蘭東印度方面所派遣之軍官。其餘字跡，亦係當時其守城將卒所留名或年代之刻字。

圖1　《基隆市志》中關於六塊石碑的文字記載頁。圖例來源：《基隆市志，1958》(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第十九種、文物篇，頁10-11。

由《基隆市志》中對於船名與人名的用詞譬如「羅烏拉」、「空摩路拉卜」、「西路比亞」或「愛魯波」、「利希杜何天炎」等推測這是日治時期以片假名音譯外來語，戰後再由片假名轉譯為漢字而成今日之用詞，因此尋找日治時期資料一有助於追溯這些敘述更早的出處，二可能獲得原始碑文內容而釐清真相。

石坂莊作所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發行於大正12年(1923)，是以手刻蠟版方式印製，碑的形狀與碑文是以手繪書寫方式呈現，因此可能是在現場描繪的。石坂莊作另有寫真，可能是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附照片的來源，從《北台湾の古碑》中無「H.M.S. Serpent 石刻」、「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石」兩碑所以《台灣北

部碑文集成》中亦無可以看出。

以下根據《基隆市志》記載的順序說明：

三、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

本碑根據《基隆市志》敘述建於「同治十年」即1871年，市志又說「相傳為爭採基隆煤礦」，按當時台灣採煤仍被清廷嚴令禁止，但早在1847年英國皇家海軍少校戈敦(David MacDougal Gordon)就已率軍艦「保皇黨號」(HMS Royalist)號來雞籠勘查煤礦。1854年美國培里提督(Adm. Matthew Calbraith Perry)派遣阿波特上校(Capt. Joel Abbot)率領「馬歇德尼亞」號 (USS Macedonian) 與辛克雷少校(Lieut. Com. Sinclair)率領「沙布萊」號(USS Supply)兩艘軍艦來台勘察煤礦。

1867年船政大臣沈葆楨已建議自行開採官煤，並先遣馬尾船場的煤鐵監工法國人都逢(M. Dupont)來雞籠勘查。1870年煤禁解除，1875年赫德介紹沈葆楨的英國籍礦業工程師翟薩(David Tyzack)來台勘查，1876年官煤正式開採。所以很難想像到1871年還會有洋人因為爭採基隆煤礦而「為我琉球藩民所殺害」，何況基隆煤礦如何能與琉球藩民發生關係？

「琉球藩民」一詞在台灣歷史上印象最強烈的出現應該是1871年10月琉球船民被排灣族殺害，引發後來日本侵的「牡丹社事件」(或稱八瑤灣琉球人事件)，這個時間點倒是十分的吻合。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那麼本碑的豎立時間就不可能是同治十年(1871年)，原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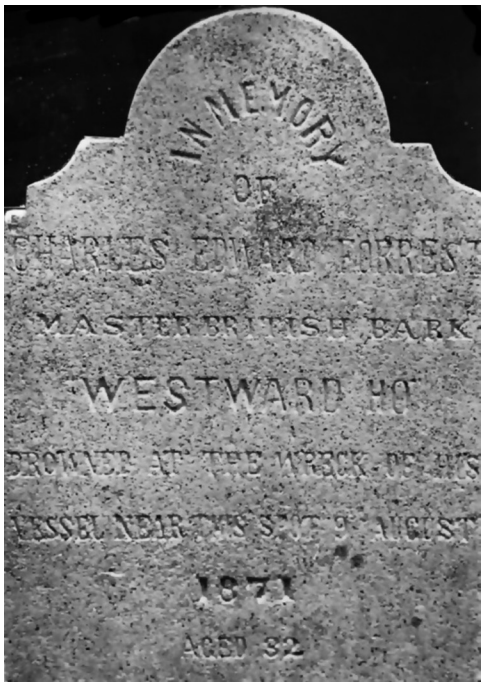
(一) 琉球船民被殺的時間已經是1871年末，時間上來說不可能在當年就豎立起紀念碑。
(二) 清廷既稱琉球船民被殺為生番所為，非其管轄範圍，怎麼可能自毀立場為其立碑？

(三) 琉球船民被殺在日軍入侵之前是小事一樁，清廷官員不可能主動為其立碑，到了日軍入侵已經是1874年的事情，就算迫於外交壓力立碑，至少也要到1875年事件結束之後才有可能。

(四) 「琉球藩民」是日本用語，清廷尚統領台灣時不可能用此詞，而日本也要到1872年9月吞併琉球王國之後才會使用。

(五) 稱「為我琉球藩民」可以肯定是從日本人的角度。

根據市志所述做出推論，此碑似是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所立，所謂同治十年是指事件發生的時間而非立碑的時間，所謂的「為我琉球藩民所殺害」事實上應該是「我琉球藩民被殺害」。至於「相傳為爭採基隆煤礦」，既稱「相傳」，大概就不一定正確了。但真相是什麼呢？以下是「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的照片(旁附碑文謄錄)：



IN MEMORY
OF
CHARLIES EDWARD FORREST
MASTER BRITISH BARK
WESTWARD HO
DROWNED AT THE WRECK OF HIS
VESSEL NEAR THIS SPOT 9th AUGUST
1871
AGED 32

圖2) 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及碑文內容。圖例來源：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頁109。

碑文的大意是「紀念英國三桅帆船「Westward Ho」號的船主Charlies Edward Forrest，他於1871年8月9日在這附近隨船而沉，享年32歲。」

相同的內容亦見於石坂莊作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チヤレス エドワ-ド」即「Charlies Edward」，書中抄錄之碑文與紀念碑一致，但石坂莊作在一旁的註釋卻出現「我琉球藩民」、「牡丹藩」、「石炭開掘」、「基隆同知」、「煤務」等與碑文無關之敘述卻與《基隆市誌》的內容吻合。[3]不過石坂莊作並未指明這些敘述與碑文有關，可能只是並列同一時間發生的其他事件，類似大事紀的寫作方式，卻讓後來的《基隆市志》誤以為是碑文的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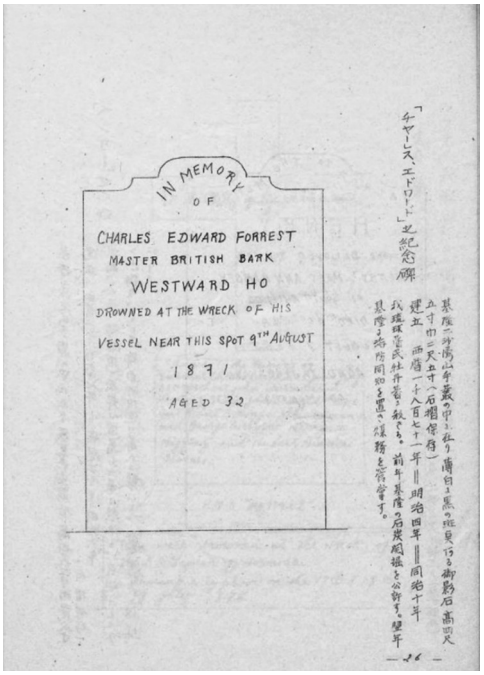


圖3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碑文抄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6。

這件事還與引進茶葉到台灣種植而聞名的英國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台灣通史》譯度益度)有關。1871年8月9日颱風襲擊雞籠，港內兩艘船被暴風吹毀，一艘是法國的「Adele」號，一艘就是本碑所提及的「Westward Ho」號。當時約翰•陶德正代理美國領事，見狀跳入水中游向法國船，將纜繩繫於船岸之間讓法國船員得以脫困，陶德因此受傷成為跛腳，「Westward Ho」號則與船主Charles Edward Forrest一同沉沒，事後法國政府要頒授榮銜給陶德被英國政府婉拒，改由英國頒授他一等亞伯達勳章(The Albert Medal of the First Class)。

4　Lan Keller, Formosa, (The Reed Institute, https://www.reed.edu/formosa/texts/JohnDoddBio.html 2019.04.10)

圖4　1871年8月9日雞籠發生大颱風，時任美國代理領事的茶商約翰•陶德因為救援遭難法國船「Adele」號船員而被授予勳章。另一艘英國籍的「Westward Ho」號則與船主Charles Edward Forrest一同沉沒，這就是本紀念碑的由來。圖例來源：作者自繪。

碑文中的「NEAR THIS SPOT」，所謂「THIS SPOT」應指的是紀念碑豎立的地點，也就是在沙灣山前、海水浴場附近，由此可推知Charles Edward Forrest喪命的地點。

四、Samuel Moyes紀念碑

《基隆市志》中提到此碑立於「光緒二年」即1876年，「相傳為攻略花蓮太魯番之荷蘭人」。如果是指十七世紀荷蘭人尚佔領台灣的年代就十分的離奇，因為在清代的光緒二年不可能為了250年前入侵台灣的荷蘭人立碑。

不過在1876年花蓮的太魯閣原住民的確因為清廷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政策，台灣鎮總兵吳光亮率兵攻打阿美族社原住民，即所謂的「大港口事件」，以立碑時間(1876年)來看這個可能性很高，因為完全吻合，而且與「攻略花蓮太魯番」之記載不謀而合，這也是台灣歷史的重要事件，但在《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抄錄的碑文則發現與

5　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頁180。此碑在該書中只有碑刻內容文字而無實物照片。

THIS TABLET
IS ELECTED BY THE OFFICERS
AND MEN OF H.M.S. LAPWING
IN AF-FECTIONATE REMEMBRANCE
OF

SAMUEL MOYES

STOKER WHO DIED AT
KEELUNG
OCTOBER 1st 1876
AGE 38 YEARS
MUCH ESTEEMED BY ALL
WHO KNEW HIM
HIS END WAS PE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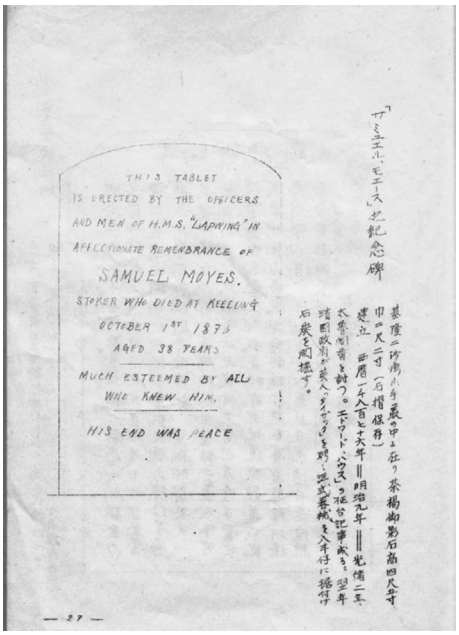


圖5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Samuel Moyes紀念碑碑文抄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7。

此事毫無關係：[5]

這座石碑由英國皇家海軍軍艦「H.M.S. Lapwing」號上的官兵所立，為了紀念1876年10月1日在雞籠去世，享壽38歲的司爐Samuel Moyes先生。認識他的人都喜歡他，他已安詳的離世。

相同內容見於石坂莊作編著之《北台湾の古碑》，「サミユエル モエ-ス」即「SAMUEL MOYES」，書中抄錄之碑文與紀念碑一致，但石坂在一旁的註釋卻出現「太魯閣藩」、「八斗仔」、「石炭開掘」等與該碑文無關之敘述卻與《基隆市誌》中的記載吻合。筆者認為此與「Charles Edward Forrest紀念碑」類似，石坂可能只是列舉同一時間發生的其他事件而非翻譯紀念碑的內容，譬如所謂「エドワ-ド ハウス」是牡丹社事件曾隨日軍來台「征台事件始末」的作者美國記者「Edward H. House」，「タイザック」則是指1875年由沈葆楨派來台灣探勘煤礦的英國籍工程師翟薩(David Tyzack)，但石坂並未提到荷蘭人。根據碑文內容這是英國軍艦「H.M.S. Lapwing」號的官兵為了死去同僚所立的碑，與攻略太魯閣藩或荷蘭人毫無關係。[6]

本碑提到的英國皇家海軍炮艦「H.M.S. Lapwing」號與台灣關係密切，多次往返於福州雞籠之間，曾經在1876年來台灣東部包括蘇澳勘查，馬偕博士就是搭乘該艦到花蓮傳教，因風浪太大及岸上原住民的敵意所以最終沒有登陸(或許受到「大港口事件」戰亂的影響)[7]。當時艦上協助馬偕的海軍軍官Henry N. S. Teignmouth後來曾出版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a naval officer’s jottings in Chi-na,Formosa and Japan在書中留下「H.M.S. Lapwing」號航行非常詳細的紀錄。

五、 H.M.S. Serpent石刻

《基隆市志》中「H.M.S. Serpent 石刻」稱傳聞為紀念來基鼓勵栽培茶樹枝英國人名羅托者，所謂「英國人羅托」應是指自福建安溪引進茶種在台灣推廣種植的英國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但是我們找不到約翰•陶德與HMS Serpent有任何連結。在《北台湾の古碑》與《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都未提及此碑，因此只能從「H.M.S. Serpent」來研究。

「H.M.S. Serpent」是指英國皇家海軍砲艦「蟒蛇」號。「H.M.S. Serpent」與台灣的關係第一個可能是1842年的「吶爾不達號事件」(Nerbudda incident)。1842年8月29日「南京條約」簽訂後， 10月8日，英國派遣「蟒蛇」號從廈門前往臺灣基隆查詢擱淺運輸船「吶爾不達號」(Nerbudda)與「阿吶號」(Ann)俘虜的下落，此時英方已獲悉俘虜悉遭處決，「H.M.S. Serpent」艦長你夫(Commander William Nevill)攜帶英國官方信函懸掛白旗進港，清廷官員拒收函件，並稱最後的生還者正被送往福州。你夫不得要領只好在10月12日返回廈門，之後「H.M.S. Serpent」號又被派往安平接回倖存的9個人。

———

6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頁27。

7 馬偕•叡理 博士 (偕叡理牧師) (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 大事年表。(project.mmc.edu.tw/records/sites/default/files/year.pdf 2019.04.10)

「H.M.S. Serpent」與台灣有關的第二個可能是1866年英國牛津大學博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曾經搭乘由砲艦「H.M.S. Serpent」號(《台灣通史》譯「薩本特號」)改裝的測量艦 (蒸氣明輪船，艦長Charles J.Bullock、輪機長John Sutton兼任攝影師)自香港來到台灣考察。

柯靈烏搭乘「H.M.S. Serpent」從高雄(Takao)航行經過淡水（Tamsuy）與雞籠(Kelung)考察大米與煤碳，測繪並命名雞籠北方三島[8]，並且溯河來到艋舺（Mangka），又遊歷了Sauo（Sano，蘇澳），6月13日到15日之間在蘇澳灣內停泊進行調查測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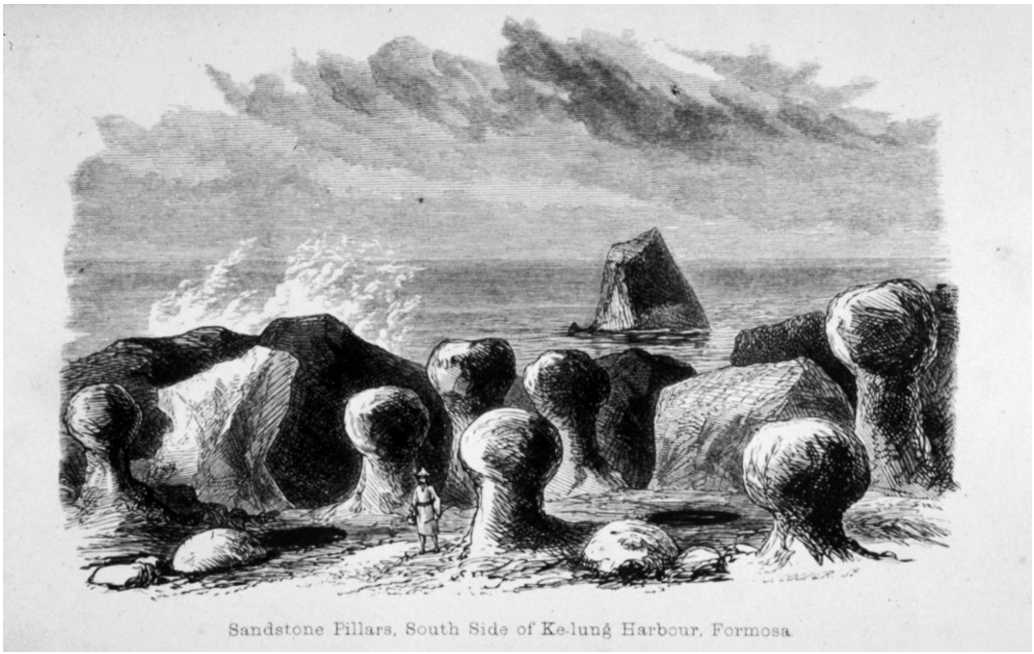


圖6　柯靈烏書中關於雞籠社寮島萬人堆海灘的鐵筆插圖，圖說形容這些像砂岩柱子(Sandstone Pillars)，奇怪的是他說這是位在基隆港的南方，但實際上應該是北方才對。圖例來源：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

8　彭佳嶼命名為Agincoort，棉花嶼命名為Crag，花瓶嶼命名為Pinacle，這些名稱記載於英國海軍的海圖中。

9　Collingwood, C.,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London–John Murray, 1868, pp. 101–102, 115.

還曾碰撞灣內暗礁，幸未造成損害。[9]柯靈烏在其1868年出版的《自然學家漫談中國海岸》(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書中留下詳細的紀錄。

總的來看，此碑以紀念柯靈烏搭乘「H.M.S. Serpent」考察台灣的可能性較高。應該注意的是1842年與1866年的「H.M.S. Serpent」不是同一艘，前者是1832年下水，後者是1860年下水，如果記載的是1860年之後的事情，那麼應該是後者。1887年一艘新的魚雷巡洋艦取代了1860年這艘並且承襲了「H.M.S. Serpent」的艦名。

六、 Burk等之簽名紀念碑石

本碑在《基隆市志》中提到本碑的時間點「咸豐十年」(1860年)正好是清廷與各國簽訂北京條約的時間，台灣的淡水、雞籠、打狗開港，此時洋船駛來各港口不無勘查試航的用意存在。清廷與葡萄牙是在7月18日簽訂的和好貿易條約，其中第4款明訂台灣與淡水為開放港口，所以葡萄牙船來台目的似與此有關。惟目前無法查出所謂「葡萄牙之愛魯波號」究係何船、來淡水調查地質的「利希杜何天炎」或「Burk」究係何人？在《北台湾の古碑》與《台灣北部碑文集成》中亦未提及此碑。

我們姑且先把葡萄牙放一邊，另外找尋史料，發現1859年普魯士攝政王派出包括3艘戰艦與1艘補給船的艦隊前往東亞，尋求與中國、日本及暹羅建立通商條約關係，進行學術與商業市場調研，並尋求建立普魯士的海外殖民地(當時的台灣也在考慮之列)。

10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ß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2. Teil, p. 4.

11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台北市：國史館刊第58期，2018.12〉，頁16-23。

1860年11月9日，普魯士艦隊中的補給船易北河號(S.M.S. Elbe)在前往日本長崎途中進入打狗港避風，船長韋納(Reinhold Werner)留下航海紀錄：

> （1860年）11月10日，風向終於稍往北吹，我們已航抵福爾摩沙島南部尖端，她的南端從西邊到東邊延伸約有4海里寬。雖在增強的季風吹襲下，能受其掩護較好。我們朝她很接近巡航，驚歎如畫的景色，滿眼看到壯麗與如階梯狀漸漸升高的島嶼，但惋惜這一塊美麗與豐腴的土地還未受文明的薰陶，特別是她不是德意志的財產。[10]

圖7　李奇賀芬（F. F. von Ricthhofen）就是基隆市志上的「利希杜何天炎」。圖例來源：(http://de.wikipedia.org/wiki/Ferdinand_von_Richthofen. 2019.04.10)

在等待的時候由於上岸打獵與原住民發生衝突，「Elbe號」發砲攻擊原住民，彌平了村莊。在東北季風稍歇後，Elbe號起碇繼續開往長崎。[11]這場西方海軍與原住民的戰鬥比1867年美國海軍遠征屏東南灣還要早，但是很少被提及。

在普魯士科學調研團隊中有一個地質學家名李奇賀芬（F. F. von Ricthhofen,《台灣通史》譯李希霍芬），他來台灣調查淡水與基隆之間的地質、硫磺礦與煤礦，回國做出報告，被稱為台灣最早的地質科學研究[12]。在普魯士遠征艦隊中還有一名風景畫家艾伯特•伯格(Albert Berg, 1825-1884)，他出版的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Fahrten des Königlichen Geschwaders

12 余文堂，《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頁28。

vom 12ten August 1860 bis zum 2ten Mai 1862. 書中有許多與台灣有關的圖文。

很顯然《基隆市志》是把普魯士誤以為是葡萄牙了。所以「葡萄牙船愛魯波號」其實就是「普魯士的Elbe號」，「利希杜何天炎」就是「李奇賀芬」，而「Burk等的簽名」似為「Albert Berg等的簽名」。

七、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

「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是指1874年一艘在英國倫敦註冊的輪船「 Laptek」號滿載糖與菸草，由船長Tough指揮自汕頭開往上海，於6月28日在基隆外海8英里處觸礁，船長設法把船擱淺在Mason Bay(可能是瑪鍊)並發出呼救，停泊在雞籠港內福建船政的「福星」號軍艦於是開來救援。船長把乘客與部分貨物卸載後又回來照顧他的船以避免被他人劫掠，當時台灣以打劫海上遇難船隻而惡名昭彰，不過這一次卻成為例外，可能是因為「福星」號管帶積極的行動所造成。事實上當時旁邊就有一艘德國的軍艦「伊莉莎白」(S.M.S. Elizabeth)號，卻拒絕「S.S. Laptek」號的求援。

在Mason Bay 停留兩天後，「福星」艦開往淡水，但因為船長的要求又回來現場停留，而且當地的清軍指揮官還派中式水師戰船前來協助。7月17日夜晚一場可怕的颱風襲擊了台灣的北部，「S.S. Laptek」號的船殼破裂，留在船上一名寶順洋行（Dodd & Co）的職員格雷格(Greig)與前來協助的英國皇家海軍H.M.S. Kestrel號一名上尉和六名水兵都被淹死了，成為一場悲劇。22日，另一艘福建船政的「萬年青」號輪船把Tough船長與其他船員免費載往上海。[13]

13 Commercial Report from China, 1874， Harrison & Sons, 1875，頁71

「S.S. Laptek」號遇難過程的記載中值得一提的是與福州船政局派駐基隆幾艘軍艦的互動，包括「萬年青」號(船政建造第一號艦)與「福星」號(船政建造第三號艦)，顯現當時清廷經營台灣海防的力度。雖然台灣海岸的人民仍然習於打劫路過遇難船隻，但官方已經具備國際海難救助的觀念，免費提供各種協助。不幸的是「福星」於1884年8月23日在清法馬江海戰中被法艦擊沉，「萬年青」於1887年在上海被英國輪船撞沉。

同樣的文獻指出其實「S.S. Laptek」的貨物已經有保險，對寶順洋行基本上不會有太大損失，為何船長堅持要留人在船上駐守，最後造成多人因船難而死亡？我們由Tough船長多次堅持要回到船上以免被他人劫掠，或許可以找到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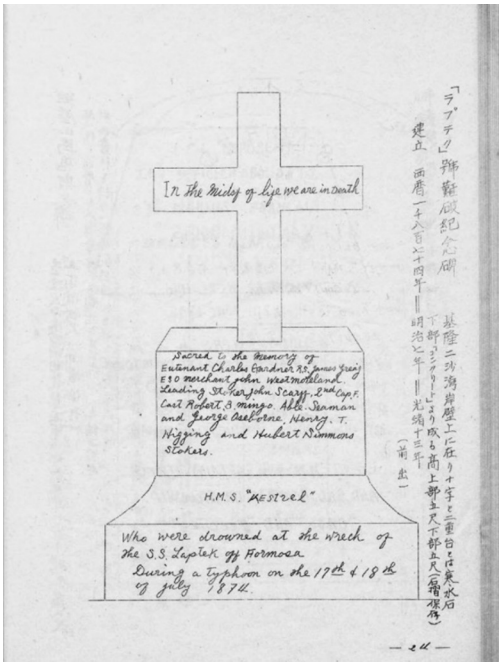


圖8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的碑文抄錄，由於本頁只敘述石碑規格而未同其他頁並列其他事件，所以「基隆市志」中也就沒有更多敘述。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4。

在石坂莊作編著的《北台湾の古碑》中有關於本碑的紀載，「ラブテク」就是「Laptek」，在十字架型的紀念碑上刻有以下文字:「In The Midst of Life We Are In Death」，「Sacred to the memory of Eutenant Charles Gardner R.S. James Greig E&O merchant John Weatmoreland, Leading Stoker John Scary, 2nd Cap. F. Cart Robert, B. mingo, Able Seaman and George Oseborne, Henry T. Higging and Hubert Simmons Stokers」，「H.M.S. Kestrel」，「Who were drowned at the wreck of the S.S. Laptek off Formosa During a typhoon on the 17th & 18th of

14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頁24。

圖9　福建船政水師的「福星」號軍艦在颱風天護衛擱淺基隆岸邊的英國輪船「SS Laptek」。圖例來源：作者自繪。

July 1874」。[14]

大意為:「生命之中死亡同在」，「紀念查爾斯·加德納中尉，E＆O商人詹姆斯·格雷格，司爐長約翰·韋特莫蘭，上等兵水手約翰·斯卡里與羅伯特敏果，以及喬治奧斯本、亨利海金和赫伯西門斯等爐工」，「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克斯特里爾號」，「1874年7月17日至18日的颱風期間淹死在位於台灣外海的Laptek號沉船中」。

由於《北台湾の古碑》中對於「S.S. Laptek輪遇難紀念碑」沒有並列其他事件，所以「基隆市志」也就沒有更多敘述。

八、 Henry石碑

《基隆市志》中在敘述「Henry石碑」時所提到的「羅烏拉」號研判應為美國三桅帆船「羅妹號」(Barque Rover，亦翻譯為「羅發號」，《台灣通史》譯「那威號」)，所謂應國艦「空摩路拉卜」實為英國砲艦「HMS Cormorant」號(「鸕鶿」號，,《台灣通史》譯「科爾摩蘭」號)，「西路比亞」號則為配合行動的英國測量艦「HMS Sylvia」號(原為砲艦，與「HMS Cormorant」同級)。這幾艘船同時出現，加上同治六年(1867年)的時間點，幾乎可以確定市志所指的就是「羅妹號事件」(Rover incident)。

「羅妹號事件」發生於1867年3月12日，造成美籍船長J. W. Hunt夫婦等13人遭原住民殺害，由於清廷地方官的不作為，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或譯李禮讓)說服亞洲艦隊司令海軍少將Henry H. Bell於1867年6月13日率”USS Hartford,”與”USS Wyoming ”兩艘軍艦搭載181名水兵與海軍陸戰隊由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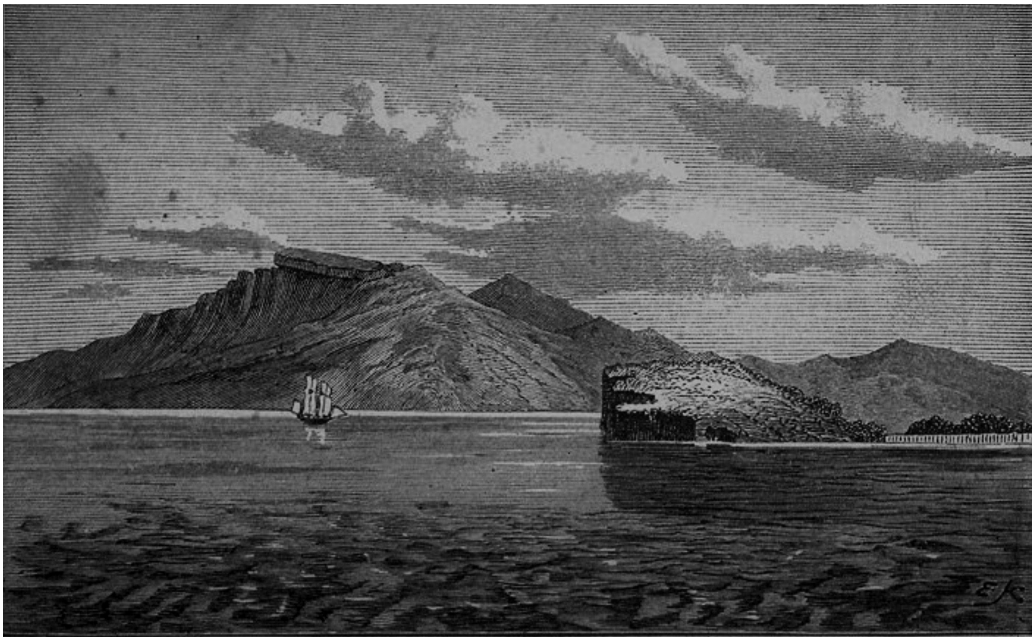


圖10　所謂應國艦「空摩路拉卜」實為英國砲艦“HMS Cormorant”號(鸕鶿號)，圖為該艦前來屏東墾丁砲轟原住民的新聞鐵筆畫。
圖例來源：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une 16, 1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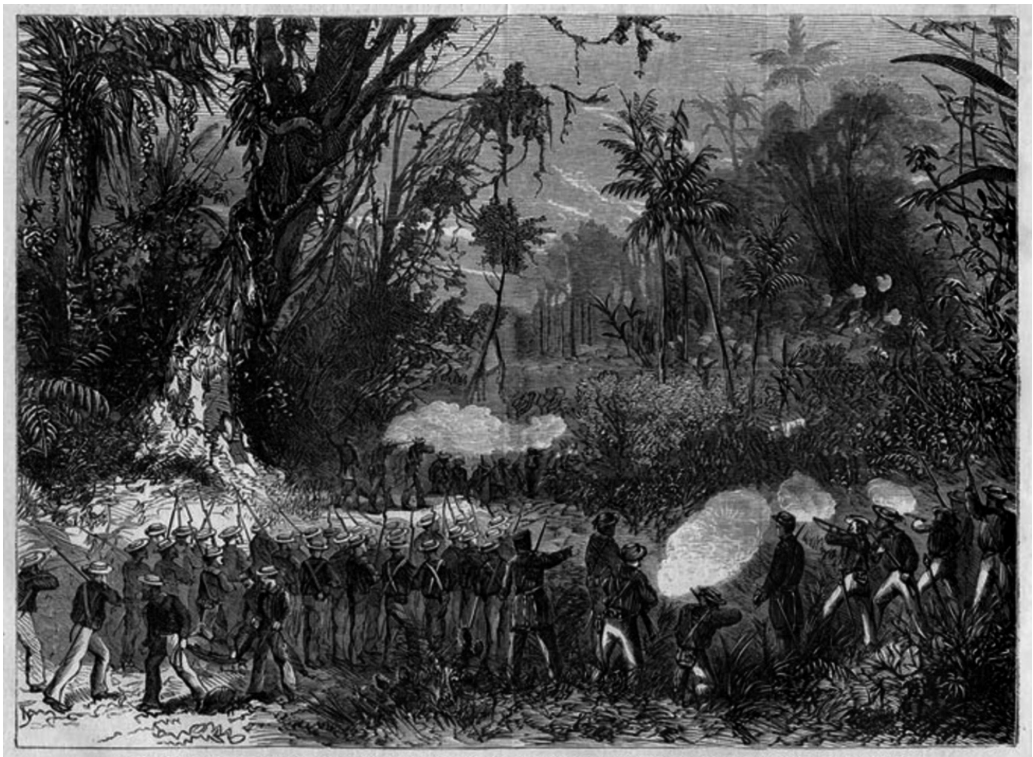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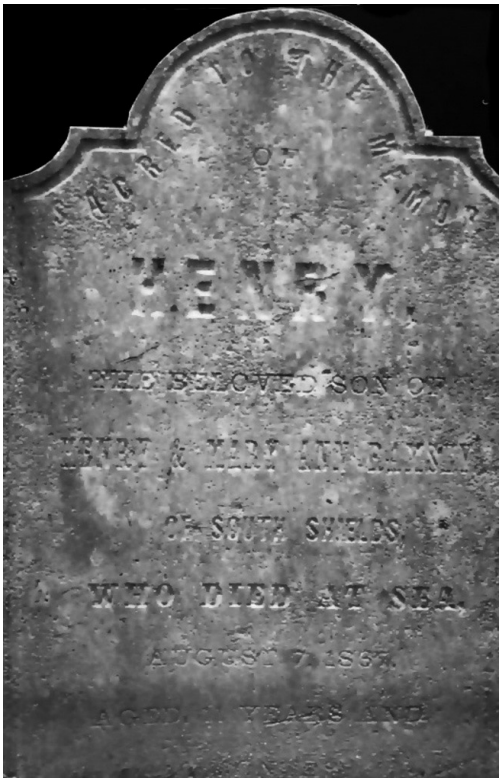


圖11　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叢林中與原住民作戰，結果出師不利，一名美國海軍軍官陣亡。圖例來源：Harper's Weekly ,7 September 1867

州出發在南台灣登陸卻遭排灣族伏擊，”USS Hartford,”號副長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 少校(《台灣通史》譯馬特希節副提督)陣亡，美軍無功而返。之後李仙得於10月10日再度抵臺終於在琅璚與排灣族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會面交涉，雙方達成協議卓杞篤同意歸還船長夫婦的首級及物品，並協議未來若有海難以紅旗為求援信號以避免誤會，此即「南岬之盟」。

如果「Henry石碑」紀念的是「羅妹號事件」那的確是台灣歷史上的大事，但《基隆市志》說成「與土藩相殺擊，此為參加作戰之外國人名」則不知所云。而且我們不解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事為何會在北部的雞籠立紀念碑？此外「Henry石碑」的Henry到底是誰？這些都引發莫大的想像空間。不過當找到「Henry紀念碑」的照片看到碑



SACRED TO THE MEMORY
OF

HENRY

THE BELOVED SON OF
HENRY & MARY ANN RAMSEY
OF SOUTH SHIELDS
WHO DIED AT SEA
AUGUST 7 1867
AGED 11 YEARS AND
10 MONTHS。

圖12　「Henry石碑」及碑文內容。圖例來源：邱秀堂編著，《台灣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6)，頁158。

文的敘述後，才發現本碑與「羅妹號事件」完全無關。

「Henry石碑」紀念的是來自南希爾茲(英格蘭Tyne河口的地名)的亨利與瑪麗安藍姆賽夫婦的兒子亨利，他在1867年8月7日死在海上，享年11歲又10個月。我們不瞭解他的死因，根據資料亨利·藍姆賽是船長，1876年之後在汕頭擔任領港，於1883年去世。[15]

15　Robert Bickers，Fifty years in China (https://robertbickers.net/2015/08/14/fifty-years-in-china/)
16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頁25。
17　1867年12月18日（同治6年11月23日）晨9:45因台灣北部大地震引發雞籠大海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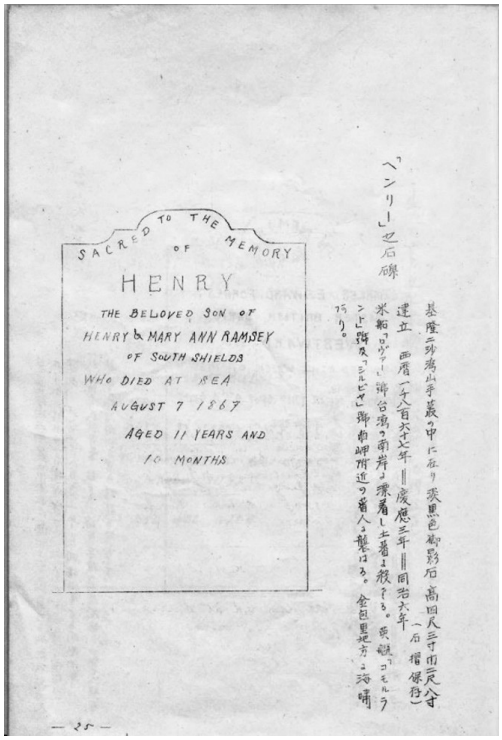


圖13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Henry石碑」碑文抄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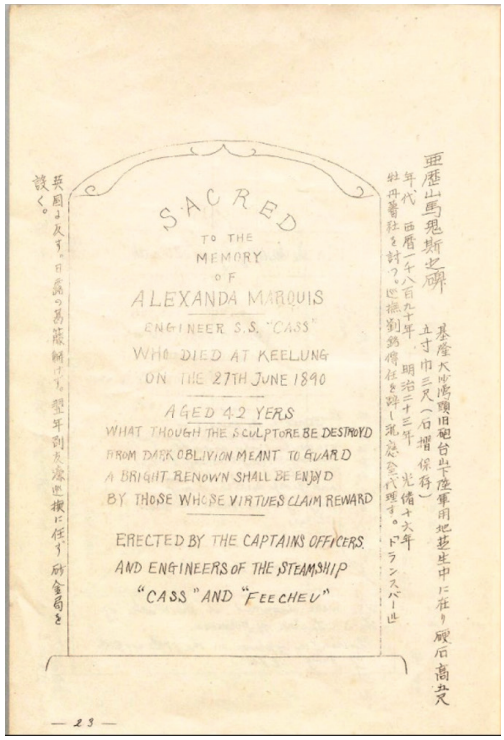


圖14　《北台湾の古碑》關於「亞歷山馬鬼斯之碑」碑文抄錄及作者的註釋。圖例來源：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3。

在石坂莊作編著的《北台湾の古碑》中有關於本碑的紀載，抄錄碑文一如前述，較特別的是旁邊的註釋文字。所謂「米船ロヴア-」就是「美國船隻Rover號」(《基隆市志》中稱「羅烏拉號」)，「英艦コモルラント」就是英國砲艦「HMS Cormorant」號(《基隆市志》中稱「應國艦空摩路拉卜」)，英艦シルビヤ」就是英國測量艦「HMS Sylvia號」(《基隆市志》中稱「西路比亞」號)，並且提到「南岬」與「藩人襲擊」。[16]可見《基隆市志》的敘述源出於此。

Henry Ramsey的死亡、「羅妹號事件」與「金包里海嘯大作」[17]都發生在1867年，

———

18 石坂莊作編著，《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頁23。。

可見將同一年發生的幾個事件並列是石坂莊作的寫作習慣。

根據《北台湾の古碑》，基隆另外還有一塊涉外紀念碑未出現在市志中就是「ALEXANDA MARQUIS」(亞歷山馬鬼斯之碑)，他是台灣商務局「駕時」號輪船(SS CASS)的管輪(Engineer)，1890年6月27日死於基隆享年42歲，碑由「駕時」與「飛捷」(SS FEECHEU)兩輪的船長所立。註釋中提到牡丹社征討、劉銘傳的請辭與沈應奎代理等事，也與碑文也無關。[18]

九、 結語

《北台湾の古碑》出版於大正12年(1923年)，所以《基隆市志》所述內容至少可以追溯到這個時間點。本書很特別的是全部用手繪及手書，如果石坂莊作能夠畫出紀念碑的式樣及內容，應該是曾親眼見到實物，有相當可信度，但石坂莊作在一旁的註釋並非碑文而是並列同一時期的其他事件，這種寫作方式可能造成《基隆市志》的誤引。

六塊石碑經筆者考證發現其所紀念的內容並不如《基隆市志》寫得那麼重要，但也是清代西方人在台灣海域的活動紀錄，彌足珍貴，更是重要的海洋文化資產。我們期待基隆市政府在下一版的市志中能夠更正，並啟動調查各碑的下落。

參考文獻

一、中文

陶文輝

1958 《基隆市誌》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

李進勇

2001 《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

邱秀堂

1986 《台灣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石坂莊作

1923 《北台湾の古碑》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

二、外文

Lan Keller,

2019 *Formosa*, (The Reed Institute, https://www.reed.edu/formosa/texts/JohnDoddBio.html 2019.04.10)

馬偕•叡理 博士 (**馬偕叡理牧師**) (Rev. Dr. George Leslie Mackay)

2019 大事年表。(project.mmc.edu.tw/records/sites/default/files/year.pdf 2019.04.10)

Collingwood, C.

1868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London–John Murray.

Collingwood, C.

1868 *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London–John Murray.

Reinhold Werner,

Die preuß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 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1861 und 1862. Reisebriefe, 2. Teil.

余文堂

2018 《19世紀普魯士統一德國前對臺灣的覬覦（1850-1870）》，台北市：國史館刊第58期

Harrison & Sons

1875 *Commercial Report from China, 1874*

Robert Bickers

2015 *Fifty years in China* (https://robertbickers.net/2015/08/14/fifty-years-in-china/)